

# 他们写了歌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

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  
伟大领袖毛主席,指引我们向前走。

短短28个字的一首儿童歌曲,传唱了近半个世纪,成为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。在这首歌曲背后,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——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13岁的上海小学生,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19岁的青年女工,他们还是一对堂姐弟兼表姐弟,俩人互相连招呼也没打分别创作了这首歌的词和曲,而且在那个时候,两人都还没有亲眼见过北京天安门……



四十多年过去了,兄弟俩在天安门广场合影

## 灵光闪现

1969年的上海,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,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,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,对他来说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。

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,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。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、写作,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。1969年11月29日,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,取名“金光照的全球红”。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太阳升起金光照,金光照的全球红!”四个七字句采取“顶针续麻”的技巧。

金果临回忆说:“创作的时候,其实很简单,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——北京天安门,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,还有葵花、红旗……”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,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。

其中的第一句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,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:“I love Peking. I love Tiananmen.(我爱北京,我爱天安门。)”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——我爱北京天安门。

在此之前,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,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。由于在1967年之后,小学里的“少先队”组织已经被“红小兵”所取代,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,将之投稿给了一份名叫“红小兵”的刊物。这也是刊发金果临“处女作”的杂志。投稿前,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,署名则是“金果临”。

但是,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作了调整。“最后登出来的时候,后两句被改成了‘太阳光辉照万里,祖国山河处处春’。”金果临说:“对一个小学生来说,这个事情很简单——我不管他是谁改的,只要诗登出来,而且题目‘我爱北京天安门’是我自己起的,就可以了,我就很高兴了。”

## 妙韵点睛

就这样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刊

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《红小兵》杂志上。此时的金果临,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“低调”,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。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报摊上看到了弟弟的大作。

金月苓和金果临,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,母亲又是亲姐妹,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,又是表姐弟。小时候,姐弟两人都曾住在奶奶家,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短,感情也比较深。她和弟弟金果临虽是童年的玩伴,但青少年时期,都不住在奶奶家,联络交流不像过去那样频繁。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天赋不是很清楚,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。

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。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,她既高兴,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。“文革”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,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过基础音乐理论,工作后还在单位的“文艺小分队”里写过歌、写过沪剧。
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太阳光辉照万里,祖国山河处处春。”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“打过招呼”,只是对着这28个字,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,之后就把自己写成的歌曲寄往《红小兵》杂志投稿了。

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,她收到《红小兵》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,那天她上夜班,终于按捺不住激动,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:“我的作品发表了。”可是,机器隆隆,对方没有听见她的话。她把样刊给同事看,对方却很诧异。

## 一曲成名

1971年的夏天,《红小兵》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,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就是其中的一首。

尽管如此,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。直到有一天,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。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:“你是不是写过《我爱北京天安

门》?”他回答是的。然后校长说:“北京发过来一个函,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,在全国推广这首歌,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。”他一下子懵了,心想:“中央都知道了,这事情弄大了。”

最后,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:“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,这个荣誉是你的,也是我们大家的。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,你也不要怕,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。”

校长的话有其深意,也有时代的特征——那时候政治风向变化很快,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“过时”甚至“转向”。这次谈话背后的意蕴,其实是那时的金果临所无法理解的。

很快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登上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。1972年4月23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》特刊,并且刊登10首歌曲,其中便有这首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,将最后两句改为了“伟大领袖毛主席,指引我们向前走”,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。之后,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纷纷转载这首歌曲。仅仅一个星期之后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……

## 命运殊途

但是,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天安门这件事上,金果临直到“拨乱反正”后的1982年,26岁的他才在出差中“见缝插针”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。

“在26岁以前,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来到北京、来到天安门广场。我真的感觉太激动、太激动了。”因为时间很早,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,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词作者。“因为担心照相效果,旁边一有游客经过,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,接连拍了十几张。”就这样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作者,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。此时,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整整13年。

1973年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唱,此时中

学毕业的金果临作为学校先进学生代表下乡成为了一名“知青”。

他在奉贤工作生活的几年里,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“四人帮”倒台,“文化大革命”宣告结束,为期十年的浩劫彻底终结,从1966年开始取消的高考也在1977年重开大门。

这一年,金果临和金月苓又不约而同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里。

姐姐金月苓此时已经27岁,她报考的是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。虽然老师都知道她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作者,但是要求仍然很严格,“基础理论、考配器、写歌、和声,最后还要考文化课,都要考,一个不落,每项考试都要通过”。最终,她顺利地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,重新开启了求学之路。金月苓那一届同学中日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艺术家,谭盾、郭文景、陈佐湟、刘索拉、叶小钢、陈其钢等都是她的同窗。但在入学之时,她的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。

1982年,大学毕业的金月苓回到上海,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,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。她又先后创作了《水龙头》《蒲公英》《小小雨滴》等一大批儿童歌曲——有的已纳入教材歌曲,有的成为声乐考级的歌曲。

高考落榜之后,金果临在农场继续他的知青生活,但心中已经有了返城的想法。那时正好有一股“顶替”风,在上海企业里工作的父母到退休年龄以后,子女有困难或者是在外地及农场工作的,可以有一个额度顶替父母工作。农场里的大喇叭只要一广播“某某某请到办公室来”,知青们就知道回上海的好消息到了。同伴们一个个离开农场、回上海去了,然而这一切始终与金果临无缘。1978年12月的一天,就在他觉得返城遥遥无期的时候,大喇叭里意外地喊出了金果临的名字。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,金果临于次年顶替了母亲的工作。后来他才知道,原来母亲为了自己回沪的事情茶饭不思,竟至在没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。金果临在这里一干就是20多年,直到工厂倒闭,才又去了另外一家民营企业。

近几年,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,提出对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这首歌曲进行改编,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,使其变成广告歌曲。对此两人早有共识。

金果临说:“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,改一个字都不行,曲是她的曲,改一个音符都不行。”金月苓也说:“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,但是我们不愿意这首歌被别人改编。”

或许,对于金家姐弟来说,这件妙手偶得的作品,足以书写一生。更何况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至今仍然在许许多多中国人心底萦回,永不褪色……

姚文婷、蔡懿鸣 来源:档案春秋